

道德和习俗领域幼儿义务推理的发展*

刘国雄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摘要 采用 Keller, Gummerum, Wang 和 Lindsey (2004)的不知情义务推理范式, 探讨了 96 名 4、5、6 岁幼儿对通过条件规则表述的鼓励性或禁止性的道德规则、以及习俗规则的义务推理能力的发展。结果表明: 1)幼儿对两种不同领域规则的义务推理表现出基本一致的发展规律, 表现出显著的“角色效应”, 即多数幼儿都能指出同伴违反, 随年龄增大指出妈妈违反、双违反的人次百分比逐渐增多, 尤其是一些 4 岁幼儿就能正确指出道德和习俗领域中的妈妈违反, 部分 5 岁幼儿即可正确指出双违反。2)在不知情的义务推理范式下, 一些 4 岁幼儿错误指出本来是妈妈违反约定的情境中同伴违反、一些 6 岁幼儿错误指出本来是同伴违反约定的鼓励性规则情境中妈妈违反。3)尽管幼儿对道德和习俗规则的义务推理没有差异, 他们对不同性质社会规则的义务推理却表现出显著差异。5、6 岁幼儿对禁止性的道德规则中同伴违反的检测显著低于对鼓励性的道德规则, 而 6 岁幼儿对双违反中妈妈违反的检测则相对更高; 6 岁幼儿对习俗规则的义务推理也表现出类似的不同性质之间的差异。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的研究结论, 反映出幼儿对道德和习俗规则进行义务推理时表现出的跨领域的一般性及其领域内的特殊性。

关键词 道德; 习俗; 义务推理; 学前儿童; 心理理论

分类号 B844

1 问题提出

义务推理(deontic reasoning)一直是认知心理学家最为关注的推理形式之一, 又译作道义推理(Zhu, 2001), 指的是对关于“允许/禁止, 或必须/不必做出相关行为”的推理(Beller, 2010), 源于 Wason (1966)研究成人的条件推理时采用的四卡片选择任务。发展心理学家很快就通过简化的任务形式对较小儿童的义务推理能力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人们发现尚未达到形式运算阶段的儿童(Girotto, Light, & Colbourn, 1988)、甚至 3、4 岁的幼儿(Cummins, 1996)都具有较强的义务推理能力, 这对传统的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 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有关儿童认知发展具有“领域特殊性”(domain specific)的研究。

按照皮亚杰的观点, 儿童的发展是领域一般的(domain general), 即儿童在各个领域的认知发展都

是大体一致的, 遵循着一条一般性的发展路线, 它决定着儿童所有方面的发展如儿童的空间概念、时间概念、液量守恒等, 处于某一认知发展阶段的儿童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该阶段特有的本质特征。而以 Turiel、Smetana 等为代表的领域心理学家依据其在社会规则领域所做的大量研究指出, 儿童的认知发展具有领域特殊性, 小至 2~3 岁的儿童就可以区分道德规则(如不许打人)和社会习俗(如不许直呼大人姓名、男生不能穿裙子), 他们在各种判断标准上(Judgment criterion)都对这两种规则作出了区别对待(Smetana, 1981; Smetana, & Rote, et al., 2012; Turiel, 2008; Weston & Turiel, 1980), 如在违反规则的严重性上, 3 岁幼儿即能认识到违反道德规则更加严重、应当给予更严厉的惩罚。近期有关条件推理的许多研究也都发现, 人们在具有现实内容的条件规则进行逻辑推理时, 其成绩远远高于对不具有现实内容的规则的推理(这被称为“内容效应”, 参

收稿日期: 2012-04-2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110075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CBA080236,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08SJBXLS0002, 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资助。

通讯作者: 刘国雄(1977-), 男, 籍贯湖北, 博士, 副教授。E-mail: Lewgx@163.com

阅 Beller, 2008; Cosmides, 1986), 而且当他们处于规则制定者或规则履行者的不同角色进行推理时推理成绩差异显著, 表现出所谓的“角色效应”(Keller, Gummerum, Wang, & Lindsey, 2004), 甚至还有研究者提出不存在领域一般的推理, 所谓领域一般的推理其本质也是领域特殊的(Thompson, 2000)。

儿童的认知发展究竟是领域一般性的, 还是表现出领域特殊性? 研究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这与研究者探讨的特定领域和采用的实验范式有关。早期的领域特殊论者多把精力集中在探讨儿童在不同的社会领域表现出的不同的发展规律(主要为研究者区分为道德、习俗以及个人事件等典型领域)(Smetana, 2006; Yau, Smetana, & Metzger, 2009), 随着心理理论研究的兴起人们又开始关注不同“核心领域”的发展(主要包括物理的、心理的以及生物的三个核心领域)(Wellman & Gelman, 1992), 当前的研究者则注意到了义务推理范式下个体对不同领域的认知具有特殊性(Fiddick, 2004), 甚至开始直接探讨幼儿的义务推理与其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Clément, Bernard, & Kaufmann, 2011; Lagattuta, Nucci, & Bosacki, 2010; McKinnon & Moscovitch, 2007; Smetana, Jambon, Conry-Murray, & Sturge-Apple, 2012; Wellman & Miller, 2008)。我们认为, 义务推理作为一种具有社会现实性的推理研究范式, 正适合探讨儿童在不同领域认知发展的共性和特性。道德规则和习俗规则是我们所处社会世界的两种基本规则, 它规定了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 或者说怎样做是人们所期望的、怎样做又是不被允许或禁止的(Smetana, 2006), 这与义务推理的本质恰巧吻合。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通过条件规则的方式来教会儿童逐渐习得这些常见的社会规则, 例如家长许诺孩子如果做出了一定的行为或成绩就给一定的奖励, 以期通过这种方式来指导、规范孩子们的行为。正是在这种日常的教养实践过程中, 成人世界的社会规则被一遍又一遍地输送给儿童, 他们逐渐掌握了这些规则、并开始熟练运用这些规则在成人世界里游刃有余。

那么, 在年幼儿童很早就认可了一些基本的道德规则和习俗规则的基础上, 他们对这两者进行义务推理时有怎样的表现呢? 尽管义务推理研究关注了儿童在很多领域的推理, 诸如对“所有吱吱叫的老鼠都必须呆在屋子里”(Cummins, 1996)、“穿上

围裙才能画画”(Núñez & Harris, 1998)、“如果你每天都保持房间整洁, 到圣诞节妈妈就给你买一个小童车”(Keller et al., 2004)、“如果这个礼拜你每天都自己穿衣服, 那么到礼拜天妈妈就带你去动物园玩”(刘国雄, 方富熹, Keller, 2003)、“如果你在一边吃饭一边玩, 那么睡觉的时候妈妈就不给你讲故事了”(刘国雄, 方富熹, 2005)之类的具有现实内容的条件规则的推理, 很少有研究关注义务推理过程中所采用的规则属于怎样的社会领域[Fiddick (2004)曾采用虚拟的非洲部落情境考察过大学生对具有安全预防、社会交换以及社会习俗内容的条件规则的推理], 更鲜有研究者同时考察年幼儿童在道德和习俗领域进行义务推理时的异同, 这正是本研究试图探讨的问题所在。

义务推理范式不同于经典的条件推理范式之处在于, 将条件规则中的前提(p)和结果(q)结合起来同时呈现给被试, 而不是仅仅呈现其中一个方面。这种简化的呈现方式有利于幼儿做出正确的推理。在 Keller 等人(2004)设计的故事情境中, 麦克西和他的妈妈事先约定, 如果麦克西在随后的两周都能保持房间整洁的话(p), 那么他在圣诞节就会得到一辆自行车(q)。然后妈妈离开了小镇, 因此妈妈不在的时候并不知道房间是否整洁; 同时, 麦克西也不确定妈妈是否能及时赶回来买自行车。然后给儿童呈现四张图片, 分别代表前提 p 和结果 q 的不同组合, 即房间整洁、有车(无人违反约定); 房间不整洁、有车(同伴违反, 即故事主人公麦克西违反约定); 房间整洁、无车(妈妈违反/权威违反, 即故事主人公的妈妈违反约定); 房间不整洁、无车(双违反), 询问儿童是否有人违反约定、并提供理由解释。由于该情境强调约定双方事先都不知道对方是否会履行约定, 故被称之为“不知情”的义务推理。刘国雄等(2003)的研究则相反, 约定双方都被假定为知道对方是否履行了约定, 这也符合中国的特定文化背景, 实际上家长一回到家立刻就能看到家里是否整洁, 很难“不知道”房间是否整洁。这种“知情”的义务推理范式设计相对复杂、需要设计更多的情境, 同时考虑到跨文化研究的需要(详见后文讨论), 我们决定采用 Keller 等人(2004)的不知情的义务推理范式来探讨年幼儿童对道德和习俗领域义务推理的发展, 并提出两个主要研究假设: 采用不知情的义务推理范式探讨幼儿对社会规则的义务推理, 有可能揭示出年幼儿童可能更早出现的对不同角色违反社会规则的检测; 幼儿在对鼓励性的

/禁止性的道德规则和习俗规则进行义务推理时可能会表现出一致的角色效应,但也可能存在一些领域内的特殊性。相关研究结果的取得有助于揭示童年早期儿童不同领域规则的认知发展特点及其可能存在的跨领域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还有助于促进儿童社会适应性的教养实践,对于培养个体从小形成良好的亲子沟通模式、发展合理的社会道德和习俗意识,对于学校的规则教育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按足岁前后 3 个月的标准,在江苏徐州 2 所中等水平幼儿园随机抽取 4、5、6 岁幼儿 96 名,形成四、五、六共 3 个年龄组,每组 32 人,平均年龄分别为 4.03、4.93、5.94 岁,标准差分别为 0.19、0.18、0.15。各组被试男孩、女孩各占一半,统计表明其平均年龄也大致相同。

2.2 实验材料

根据实验中要讲述的故事内容,设计了 A、B、C、D 四组图画,每组 4 张。分别涉及两个道德规则(“如果你每天帮助生病的张奶奶拿牛奶,到元旦妈妈就给你买个小童车。”“如果你再打别人的话,妈妈就把你关在屋子里。”)和两个习俗规则(“如果你主动向客人问好,妈妈就给你买洋娃娃。”“如果你再随便叫爷爷的名字,妈妈就让你罚站。”)以道德规则为例,图片内容见表 1,打人故事的图片见图 1。

2.3 实验设计

本研究为 3 (年龄: 4、5、6 岁) × 2 (规则领域: 道德规则、习俗规则) × 2 (规则性质: 鼓励性的、禁止性的) × 3 (违反角色: 同伴违反、妈妈违反、双违反) 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年龄为被试间变量,规则领域、规则性质和违反角色是被试内变量。此外,4 个故事中都设计了没有违反者出现的干扰项(图片①)。

表 1 故事 A、B 的图片内容

图片 A①, 无 违 反	小明每天都帮助张奶奶拿牛奶了,到元旦妈妈买了小童车。
图片 A②, 妈妈违反	小明每天都帮助张奶奶拿牛奶了,到元旦妈妈没有买小童车。
图片 A③, 同伴违反	小明没有帮助张奶奶拿牛奶,元旦的时候妈妈买了小童车。
图片 A④, 双 违 反	小明没有帮助张奶奶拿牛奶,元旦的时候妈妈没有买小童车。
图片 B①, 无 违 反	小伟没有打别人,妈妈没有关他。
图片 B②, 妈妈违反	小伟没有打别人,妈妈把他关起来了。
图片 B③, 同伴违反	小伟打别人了,妈妈把他关起来了。
图片 B④, 双 违 反	小伟打别人了,妈妈没有关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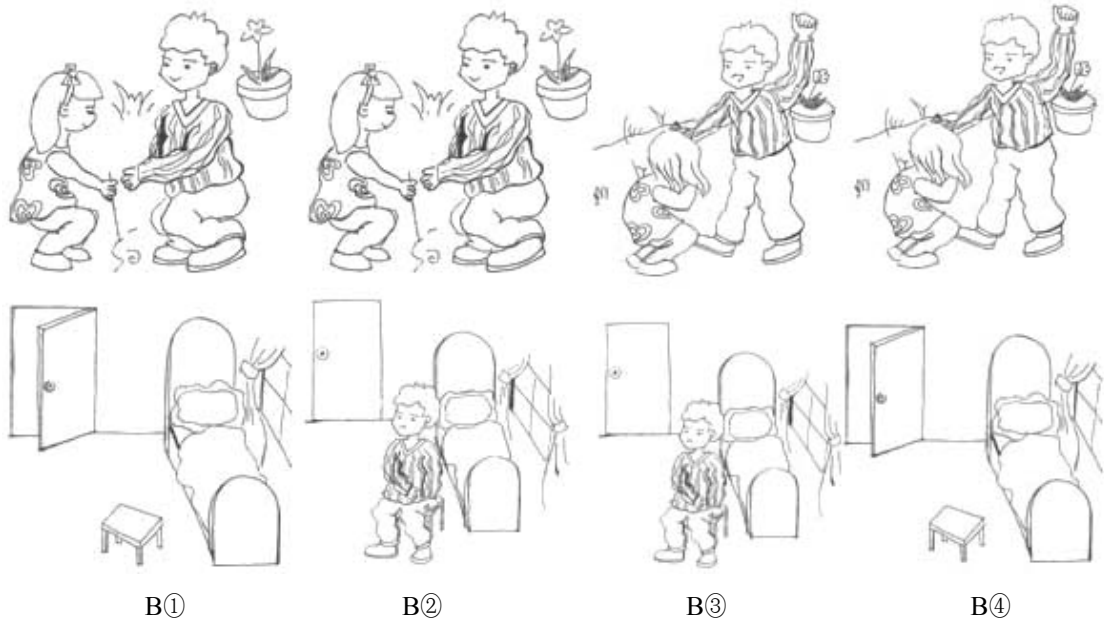


图 1 故事 B 的四张图片

2.4 实验程序

实验通过个别测查的方式进行,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学研究生按照标准指导语以讲故事的形式实施。四个故事的讲述顺序进行了平衡。以故事 B 为例,主试和儿童彼此熟悉之后开始讲故事:

“这是小伟(指)。小伟有个小毛病,就是平时爱打人。妈妈(指)很生气,她警告小伟说:‘如果你再打别人的话(指),妈妈就把你关在屋子里(指)。”小伟不想被关起来,就答应妈妈不再打别人了。

现在妈妈到别处去了,小伟有没有打人妈妈是看不到的。等妈妈回来之后,会不会把小伟关起来呢,小伟也不知道。

好,现在你告诉我,小伟答应妈妈什么了?妈妈要怎么惩罚小伟呢?”(此处为记忆检查,如果答错则重讲一遍故事)

然后将故事 B 的 4 张图片随机摆在儿童面前,让被试能同时看到每张画,按照表 1 的指导语逐个介绍图片,然后提出以下任务:“现在你自己再看看这些画,挑挑看,这四张画上面都有谁说话不算数了?请你挑出来好吗?”每挑一个图,随即问是谁说话不算数,为什么...(所挑违反者)说话不算数?”等儿童回答完毕再追问:“你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人说话不算数呢?”直到儿童说没有为止。

2.5 结果分析与处理

所有实验都结束后将访谈结果进行编码,最终数据用 SPSS 11.0 处理。在每个故事的 4 张图片中,未指出任何违反者记为 0,指出同伴违反记为 1,指

出妈妈违反记为 2,认为同伴和妈妈都违反按其指出顺序记为 12 或是 21,最后根据其回答是否正确进行计分。例如故事 B 中,指出图片②中妈妈违反计 1 分,指出图片③中孩子违反计 1 分,指出图片④中孩子违反且还能指出妈妈违反计 1 分,其他计 0 分,不扣分。此外我们还记录了被试给出的理由解释,但本研究不对其着重分析,作为其作业态度和分析讨论的辅助参考。

3 结果

3.1 幼儿对道德领域的义务推理

各年龄组对道德领域中不同违反者的检测情况见表 2、表 3。可以看出,

1)幼儿对道德规则的义务推理表现出显著的发展趋势。尽管各组幼儿都能很好地指出同伴违反,但他们在对妈妈违反、以及双违反的认知却表现出明显的年龄差异,主要表现为随年龄增大能指出妈妈违反、双违反的百分比明显增加,尤其是 4 岁组幼儿只有少数能指出妈妈违反,而且没有人(0%)能指出双违反。

对年龄效应的 Crosstabs 统计检验表明,故事 A 中指出同伴违反的人数百分比年龄差异不显著, $\chi^2(2)=1.33, p>0.10$, 指出妈妈违反的百分比年龄差异显著, $\chi^2(2)=32.27, p<0.001$, 指出双违反的百分比年龄差异也达到了显著水平, $\chi^2(2)=8.70, p<0.02$ 。故事 B 中也存在类似的统计规律,相应的统计值分别为 $\chi^2(2)=3.47, p>0.10$; $\chi^2(2)=42.63, p<0.001$;

表 2 故事 A*中对不同违反者的检测

所检测违反者的角色	4 岁组	5 岁组	6 岁组	合计
正确指出同伴违反	68.8	75.0	81.3	75.0
正确指出妈妈违反	18.8	65.6	87.5	57.3
正确指出双违反	0	18.8	25.0	14.6
正确指出双违反中的妈妈违反	6.3	25.0	28.1	19.8
正确指出双违反中的同伴违反	71.9	78.1	50.0	66.7

注: *所涉及的规则为: 如果你每天帮助生病的老奶奶拿牛奶, 到元旦的时候妈妈就给你买个小童车。

表 3 事 B*中对不同违反者的检测

所检测违反者的角色	4 岁组	5 岁组	6 岁组	合计
正确指出同伴违反	75.0	59.4	53.1	62.5
正确指出妈妈违反	12.5	56.3	93.8	54.2
正确指出双违反	0	18.8	40.6	19.8
正确指出双违反中的妈妈违反	6.3	34.4	75.0	38.5
正确指出双违反中的同伴违反	62.5	81.3	62.5	68.8

注: *所涉及的规则为: 如果你再打别人的话, 妈妈就把你关在屋子里。

$\chi^2(2)=16.67, p<0.001$ 。

2) 幼儿对道德领域的义务推理具有明显的“角色效应”，他们在指出同伴违反、妈妈违反以及双违反时显得越来越困难。使用 2 个相关样本的符号检验结果显示，幼儿指出同伴违反的情况显著好于指出妈妈违反， $Z=2.48, p<0.02$ ，指出妈妈违反的情况显著好于指出双违反， $Z=6.40, p<0.001$ 。

但故事 B 有所不同，尽管幼儿指出妈妈违反的情况显著好于指出双违反， $Z=5.58, p<0.001$ ，他们指出同伴违反的情况仅仅略好于指出妈妈违反，未达显著水平， $Z=1.09, p>0.10$ 。进一步分析显示，5 岁组对妈妈违反的认识基本等于其对同伴违反的认识， $Z=-0.24, p>0.10$ ，而故事 A 中 5 岁幼儿对妈妈违反的认识要明显好一些；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 6 岁组幼儿指出妈妈违反的百分比显著超过了指出同伴违反的， $Z=3.36, p<0.002$ ，而故事 A 中他们对妈妈违反的认识基本等于对同伴违反的认识， $Z=0.71, p>0.10$ 。这可能与被试的年龄、以及道德规则的性质有关。

3) 在对双违反的检测中，大多数幼儿都能指出双违反中的同伴违反，但能同时指出其中妈妈违反的就相对少的多。需要注意，6 岁组幼儿对故事 B 双违反图片中妈妈违反的检测甚至超过了其对同伴违反的检测，这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和思考。

3.2 幼儿对习俗领域的义务推理

从表 4、表 5 可见，4~6 岁幼儿对习俗领域的义务推理表现出类似于道德领域的发展规律与角色

效应：幼儿都能很好地指出同伴违反，随着年龄增长他们指出妈妈违反和双违反百分比逐渐增加，甚至 5、6 岁幼儿在指出双违反、以及双违反中的妈妈违反时同样类似于其在道德领域对相关角色的检测。幼儿对道德和习俗领域的义务推理的差异分析详见结果 3.3。

3.3 幼儿对道德和习俗领域的义务推理的差异

为更好地揭示幼儿对不同领域社会规则的认知发展差异，我们对幼儿的义务推理进行 3 (年龄：4、5、6 岁) $\times$ 2 (规则领域：道德规则、社会习俗) $\times$ 2 (规则性质：鼓励性的、禁止性的) $\times$ 3 (违反角色：同伴、妈妈、双违反) 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领域主效应不显著， $F(1, 93)=0.24, p>0.10$ ；规则性质主效应显著， $F(1, 93)=6.86, p<0.02$ ；违反角色主效应显著， $F(2, 186)=104.87, p<0.001$ ；年龄主效应显著， $F(2, 93)=25.83, p<0.001$ 。与领域有关的各交互作用均未达显著水平；规则性质与年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93)=1.33, p>0.2$ ；规则性质与违反角色交互作用显著， $F(2, 93)=5.46, p<0.01$ ；规则性质与违反角色、年龄三重交互作用显著， $F(2, 93)=3.41, p<0.01$ 。

规则领域的主效应及其与其它因素的交互作用均未达显著水平，似乎学前儿童对道德和习俗领域的义务推理表现出很强的跨领域的一致性。然而，对规则性质与违反角色、年龄三重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6 岁组幼儿对禁止性的社会规则中同伴违反的检测要显著低于鼓励性的， $F(1,$

表 4 故事 C*中对不同违反者的检测

所检测违反者的角色	4 岁组	5 岁组	6 岁组	合计
正确指出同伴违反	81.3	75.0	71.9	76.0
正确指出妈妈违反	18.8	65.6	93.8	59.4
正确指出双违反	0	21.9	18.8	13.5
正确指出双违反中的妈妈违反	0	21.9	18.8	13.5
正确指出双违反中的同伴违反	65.6	68.8	59.4	64.6

注：*所涉及的规则为：如果你主动向客人问好，妈妈就给你买洋娃娃。

表 5 故事 D*中对不同违反者的检测

所检测违反者的角色	4 岁组	5 岁组	6 岁组	合计
正确指出同伴违反	65.6	75.0	53.1	64.6
正确指出妈妈违反	12.5	46.9	81.3	46.9
正确指出双违反	0	9.4	43.8	17.7
正确指出双违反中的妈妈违反	6.3	28.1	68.8	34.4
正确指出双违反中的同伴违反	56.3	68.8	68.8	64.6

注：*所涉及的规则为：如果你再随便叫爷爷的名字，妈妈就让你罚站。

93)=8.97, $p<0.01$, 5 岁组幼儿对禁止性的社会规则中妈妈违反的检测要显著低于鼓励性的, $F(1, 93)=6.22$, $p<0.02$, 6 岁组幼儿对禁止性的社会规则中双违反的检测要显著高于鼓励性的, $F(1, 93)=18.04$, $p<0.001$, 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双违反中妈妈违反的检测上, $F(1, 93)=56.93$, $p<0.001$ 。这提示我们, 义务推理的领域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还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3.4 各组幼儿的错误报告分析

首先, 只有极少数幼儿、主要是年幼的 4、5 岁幼儿认为并没有人违反规则约定的干扰图片①中出现了违反(通常认为是同伴违反, 仅个别案例回答主人公、妈妈之外的第三者“老奶奶”), 可认为本研究的实验范式有效。归因分析也表明, 这些被试给出的均为无关理由, 例如回答“没去问候奶奶”、错误地回答“小明没有帮奶奶拿牛奶”、或是未作回答。

其次, 有一些 4、5 岁幼儿, 尤其是四个故事中分别有 25%、43.8%、31.3%、34.4% 的 4 岁幼儿认为, 本应是妈妈违反约定的图片②中, 同伴违反了约定。归因分析显示, 他们给出的归因多为无关理由, 如“他(拿牛奶)是骗妈妈的”, “后来没有拿牛奶”, “(拿了牛奶却回答)没有帮奶奶拿牛奶”, 有 4 名 4 岁、1 名 5 岁幼儿给出“妈妈没有买车”、“妈妈关起来了”这种结果定向的归因, 似乎妈妈不给买车或是把儿童关起来说明小孩不听话, 故而是同伴说话不算数, 这反映出年幼儿童服从权威的倾向性。

此外, 还有一些 5、6 岁幼儿、尤其是故事 A 中有 25%、故事 C 中有 40.6% 的 6 岁幼儿认为, 本应是同伴违反约定的图片中, 妈妈违反了约定, 似乎儿童不帮助拿牛奶或不向客人问好妈妈就不应该给奖励。归因分析显示, 他们给出的归因多为无关理由, 这可能与本研究的实验范式有关。

4 讨论

4.1 道德和习俗领域幼儿义务推理的发展

首先, 4~6 岁幼儿对社会规则的义务推理表现出非常清晰的发展进程, 尤其对权威违反、以及双违反的检测率都超过了前人研究。不论是道德还是习俗领域, 幼儿的义务推理在 4~6 岁之间获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 这与人研究结果是基本一致的(刘国雄等, 2003)。早期研究中, 幼儿的义务推理主要涉及故事主人公和长辈之间订立的社会约定, 属于个人领域的范畴, 不涉及社会规则。由于 2、3

岁的幼儿即具有对社会规则的初步理解, 他们清楚地知道打人、随便喊爷爷的名字不对, 我们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他们对道德规则和习俗规则的义务推理。与刘国雄等(2003)的研究相比, 本研究选取了同样年龄段的被试, 但测查到了更好的推理成绩。比如该研究中 4 岁幼儿还没有人能检测妈妈违反、5 岁幼儿也没有人能检测双违反, 本研究相应的检测率都明显超过了零水平。而国外 Keller 等(2004)的研究被试年龄更是偏大, 该研究中平均年龄 5.3 岁的幼儿只有约 37.5%能识别妈妈违反, 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了儿童对约定双方违规之后的情绪反应的认知。考虑到本研究采用 Keller 等(2004)的义务推理范式与刘国雄等(2003)的略有不同, 还不能完全断定幼儿义务推理成绩的提高是由于推理中采用的条件规则具有道德和习俗领域的内容, 实验范式、实验材料等的差异都有可能对幼儿推理成绩的提高产生影响(详见讨论 4.2), 但毫无疑问本研究中幼儿的表现超过了前人的研究, 尤其是有近两成的 5 岁幼儿、1/4 的 6 岁幼儿成功检测到双违反的出现, 这大大突破了早期研究对幼儿义务推理能力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 在同伴违反条件下, 只有略多于半数的 5、6 岁幼儿正确指出打人的主人公、以及略多于半数的 6 岁幼儿指出随便叫爷爷名字的主人公违反了事先的约定(而不是道德或习俗本身), 而且在孩子打人或随便喊爷爷名字、而妈妈不给惩罚的双违反条件下, 占绝对多数的 6 岁幼儿正确指出了其中的妈妈违反。不论亲子之间是否存在约定, 违反一项禁令性的社会规则本来就是不对的, 前人研究早就揭示 3 岁幼儿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为何在道德和习俗规则情境下, 许多年龄较长的 5、6 岁幼儿忽略了对同伴违反的检测、而增加了对处于权威地位的妈妈违反的检测呢?

我们认为这可能反映出个体很早就开始出现的、在较好把握了道德和习俗规则基础上个人领域的扩张。尽管年幼儿童很早就认可了成人的道德世界和社会习俗, 但有研究显示如果成人制定的规则侵犯了儿童的个人领域(如好朋友、闲暇活动和穿衣的选择), 4~7 岁儿童通常会认为可以违反成人制定的这些规则、并因此感觉良好(Lagattuta et al., 2010), 这一结果正与前述现象一致, 反映出年幼儿童的自我意识快速发展, 他们正在逐步摆脱对权威的依赖, 越来越多地关注自身的权利。年幼的 4 岁幼儿还在关注同伴违反约定、单向地服从权威,

甚至有不少4岁组幼儿错误地认为妈妈没有履行约定图片中的同伴违反了约定,而年长的6岁幼儿则开始从单向地服从权威转向挑战权威的合法性,甚至有较多的6岁幼儿错误地指出本应是同伴违反约定的图片中,妈妈违反了约定(参见结果3.4错误报告分析)。可以预期,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儿童的自主权限不断扩大,个人领域不断扩张、甚至会反过来对道德和习俗领域产生一定的冲击。这反映出儿童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秩序混乱,但却可能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甚至有研究者提出这可能与其将来的领导才能有关(Avolio, Rotundo, & Walumbwa, 2009),那些惧怕权威的幼儿将来社会化程度要差一些(Kochanska et al., 2010)。我们主张个人领域的扩张与社会秩序的规范应该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而且跟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应当随个体年龄增长有所变化。比如有学者曾指出,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儿童更有责任感,他们更能自觉地遵守道德规则、社会习俗、生活常规,违背社会规则更容易感到羞耻,而个体主义文化不利于幼儿社会规则的习得,尤其是道德推理的发展(Triandis & Suh, 2002)。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跨文化研究的进一步验证,也是我们的后续研究会积极关注和探讨的。

其次,幼儿在道德和习俗领域的义务推理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发展规律,是否说明义务推理范式下年幼儿的认知发展具有跨领域的一致性呢?我们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尽管方差分析显示社会领域的主效应不显著,与领域有关的各交互作用也未达显著水平,对比表3、表4或表2、表5都可以发现幼儿对不同社会规则的义务推理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表现为较大幼儿在“随便打人”和“主动向客人问好”两种社会规则下,对同伴违反以及双违反中妈妈违反的检测差异明显。根据方差分析的结果,年长幼儿对不同性质(鼓励或是禁止)的社会规则的义务推理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他们对不同类型(道德或是习俗)的社会规则的义务推理则没有明显差异,而且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这似乎说明幼儿义务推理的领域性主要体现在规则的性质(鼓励性的还是禁止性的)、而非规则的类型(即通常所说的道德和习俗两个领域)。然而,前人同样有研究考察了年幼儿童对条件许诺和条件警告的理解(刘国雄, 方富熹, 2005; 刘国雄等, 2003; Politzer & Nguyen-Xuan, 1992),条件许诺和条件警告的关系恰恰类似于本研究中鼓励性的社会规则和禁止

性的社会规则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任务采用的都是个人领域的事件,结果并没有观测到两种不同性质的条件规则下幼儿义务推理的差异。这提示我们,义务推理的领域性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结合本研究中年长幼儿对妈妈违反、以及双违反具有更高的检测率的结果,我们倾向于认为不能对义务推理范式下幼儿认知发展的领域性作出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而是兼具领域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特点,甚至还可以将“领域”划分的更细一些,不必将领域概念拘泥于道德和习俗这两个已知的经典领域之间,也可以在已经确认的领域内部、在其它可能的未知领域寻找更多的、具有特定认知规律的“领域”。

4.2 幼儿义务推理的影响因素分析

综合来看,幼儿对道德和习俗领域的义务推理的发展还受到很多因素,诸如所采用的研究范式和实验材料、社会文化背景、儿童的道德认知水平、以及心理理论的发展水平等的影响,而且这些问题在本研究中都有所体现,也是我们计划在后续研究中详加探讨的问题所在。

本研究采用的推理范式有一个很显著的特色:一方面沿袭了刘国雄和方富熹(2003)研究中的问题呈现方式,要求儿童尽可能地指出故事中的违反者、并追问直到儿童说没有为止,另一方面又采用了西方文化下“不知情”的任务呈现方式。在实验材料的选取上我们也努力做到严格对等,所有的故事都涉及儿童和母亲、以及与规则违反有关的第三者(这也是社会规则不同于个人领域之处,如刘国雄和方富熹(2003)的研究就不涉及约定之外的第三方)。本研究中基本没有幼儿错误地指认干扰图片、也没有人错误地指认约定双方以外的第三者(参见结果3.4错误报告分析),而且两种范式下幼儿的义务推理都表现出类似的发展规律和角色效应,这一方面说明追问幼儿的问题呈现方式是有效的,并没有因此导致年幼儿童胡乱作答,同时也说明“不知情”的任务呈现方式同样适用于中国儿童,而且有利于探测年幼儿童很早就可能表现出的推理潜能。

正如问题提出部分所述,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习惯性地默认约定双方都会知道对方在干什么,至少也会在见到对方之前就打探清楚对方究竟有没有履行约定,然后再据此做出行为。尤其是年幼儿童还处于服从权威的道德认知水平,处于权威地位的家长更有特权先查实小孩是否履行了约定,然后再决定是否给予奖励或惩罚。因此,刘国雄和方富

熹(2003)的研究采用了“知情”的义务推理范式,而且较国外研究探测到幼儿更早就表现出的义务推理潜力。这一范式下违反情境的设计,尤其是同伴违反、双违反的设计与本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帮助生病的老奶奶拿牛奶、到元旦妈妈买小童车的情境中,“知情”条件假定儿童主人公、以及妈妈都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如果主人公没有帮助拿牛奶,不论妈妈是否买车、只要主人公不要车,就不算主人公违反约定(当然这里还需要考虑事先是怎么约定的),因此在“主人公不拿牛奶、妈妈买车”的情境下主人公没有违反约定,研究者附加了主人公仍然吵着要车的“意图”,才设计出同伴违反的情境;而在不知情的设计下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行为,因此都应该履行各自的义务,“主人公不拿牛奶、妈妈买车”不需要附加主人公“意图”也属于同伴违反情境。同样的,“知情”条件下,如果妈妈没有买车,主人公是否帮助拿牛奶无所谓,因此在“不拿牛奶、不买车”的情境下同伴、妈妈都没有违反约定,双违反被设计成主人公不拿牛奶、还吵着要车,最后妈妈拗不过只好买了车(这也符合我国的文化背景);而在“不知情”的设计下,“不拿牛奶、不买车”的情境中双方都没有履行事先的约定,属于双违反。

实际研究中被试的图片选择结果是支持上述分析的。在“不按时睡觉、不买车”的情境中,“知情”范式下多数 4~6 岁幼儿认为同伴违反约定,但没有人认为妈妈违反约定,而本研究中该情境的表述与前人研究完全一致(除了约定双方事先并不“知情”),各组幼儿对其中同伴违反的检测也都很高,但有很多 5 岁、尤其是 6 岁幼儿同时检测到其中的同伴和妈妈双违反。而且,本研究还观测到一种很有趣的错误反应,即有不少 5、6 岁尤其是 6 岁幼儿认为本来应该是孩子说话不算数的图片中,妈妈说话不算数。例如被试认为妈妈说话不算数,因为“(小明)不给拿牛奶,不拿妈妈也给买车子了”。这样的被试虽然同时考虑到了条件规则中的前提和结果,其认知水平并不低,但是却忽略了妈妈对于小明是否拿牛奶并不知情这一先决条件(实验中已明确告知被试这一条件)。在 Keller 等(2004)的研究中,也有许多较大儿童倾向于将权威违反规则的行为解释成同伴违反规则的后果,而忽视权威事先并不“知情”这一先行条件,似乎权威拥有无所不知的能力。这些都表明“不知情”的研究设计的确对幼儿的义务推理产生了影响。

应当注意到,是否“知情”不仅仅是个文化习惯

问题,恰巧还涉及年幼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知与不知”正是年幼儿童心理理论中得到较早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分(方富熹, Wellman, 刘玉娟, 刘国雄, 亢蓉, 2009),本研究“不知情”的研究范式恰巧将一个相对简单的心理理论任务嵌入到了义务推理范式中。有研究显示,3 岁幼儿对“知与不知”即表现出较好的认识(根据方富熹等(2009),其通过率为 67.7%,4 岁可达 93.5%),但对怎么知道的认知则发展得相对晚一些(杨小冬, Twila, 刘国雄, 方富熹, 2004)。本研究中“妈妈到别处去了,小伟有没有打人妈妈是看不到的。等妈妈回来之后,会不会把小伟关起来呢,小伟也不知道。”这需要幼儿对于约定双方都不知情有所认识,较方富熹等(2009)的任务要难一些,对幼儿的心理理论水平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由于同时涉及约定双方都不知情,而且幼儿认识“不知”比认识“知”需要更多的认知负荷,这都可能是幼儿的心理理论发展水平影响其义务推理发展的关键所在。

除了“知与不知”,前面提及的意图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幼儿义务推理成绩。对“意图”的理解也是幼儿心理理论发展中很早就获得的能力,在附加了主人公“意图”之后,前人研究中 4~6 岁幼儿对同伴违反的检测要明显多于本研究,但对双违反的检测则较本研究要低的多;Keller 等(2004)的研究则显示,一些较大儿童也很少考虑主人公在违反规则之后从权威那里得到好处的意图;Núñez 和 Harris (1998)的研究发现,3~4 岁幼儿在不涉及意图条件下的义务推理成绩更高,他们对故意违规的检测强于对意外违规的侦测。这些前人研究结果恰与上述分析相一致,突显出意图因素在幼儿的义务推理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幼儿义务推理的发展不仅仅是恰巧与其心理理论的发展表现在同一年龄段,而是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可参见 Wellman 的一项近期研究综述(Wellman & Miller, 2008),关于意图、“知与不知”等心理理论成分的发展与幼儿义务推理的内在关联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最后,在本研究的实验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出于研究设计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现实生活中惩罚性的教养手段在很多家长身上都比较常见,我们在探讨禁止性的社会规则时提及了一些惩罚性的教育手段如罚站、关在屋子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应该对违反规则的年幼儿童实施这样的惩罚手段,尽管实验过程中我们并没有观察到一例幼儿对此做出异常的或是过激的反应。实际上不论鼓励还是

惩罚都有其教育价值, 都需要注意方式, 与惩罚有关的教育效果和策略建议阅读一些相关文献(Vittrup & Holden, 2010; Verhoeven, Junger, van Aken, Dekovi, & van Aken, 2010)。

5 结论

研究采用不知情的义务推理范式, 结合了“知与不知”的心理理论任务, 探索到学前儿童更早就出现的对权威违反、以及双违反的检测, 一方面揭示出幼儿在对道德和习俗领域的社会规则进行义务推理时表现出的跨领域一般的发展规律, 同时还发现他们在对禁止性的、以及鼓励性的道德或习俗规则进行义务推理时表现出的显著差异。这些结果对前人的研究结论有所突破, 反映出幼儿对道德和习俗规则进行义务推理时表现出的跨领域的一般性及其领域内的特殊性, 为当前有关个体认知发展的领域特殊论与普遍观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参 考 文 献

- Avolio, B. J., Rotundo, M., & Walumbwa, F. O. (2009). Early life experiences as determinants of leadership role occupancy: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al influence and rule breaking behavior.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 329-342.
- Beller, S. (2008). Deontic norms, deontic reasoning, and deontic conditionals. *Thinking & Reasoning*, 14(4), 305-341.
- Beller, S. (2010). Deontic reasoning reviewed: Psychological questions, empirical findings, and current theories. *Cognitive Processing*, 11(2), 123-132.
- Clément, F., Bernard, S., & Kaufmann, L. (2011). Social cognition is not reducible to theory of mind: When children use deontic rules to predict the behaviour of others.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4), 910-928.
- Cosmides, L. (1986). Deduction or Darwinian algorithms? An explanation of the "elusive" content effect on the Wason selection task.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47, 358.
- Cummins, D. D. (1996). Evidence of deontic reasoning in 3- and 4-year-old children. *Memory and Cognition*, 24(6), 823-829.
- Fang, F. X., Wellman, H. M., Liu, Y. J., Liu, G. X., & Kang, R. (2009).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s: The sequences of theory-of-mind development in Chinese preschooler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1(8), 706-714.
- [方富熹, Wellman, H. M., 刘玉娟, 刘国雄, 亢蓉. (2009). 纵向再探学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模式. *心理学报*, 41(8), 706-714.]
- Fiddick, L. (2004). Domains of deontic reasoning: Resolving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ognitive and moral reasoning literatur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7(3), 447-474.
- Giroto, V., Light, P., & Colbourn, C. J. (1988). Pragmatic schemas and conditional reasoning in children.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40(3), 469-482.
- Keller, M., Gummerum, M., Wang, X. T., & Lindsey, S. (2004). Understanding perspectives and emotions in contract violation: Development of deontic and moral reasoning. *Child Development*, 75(2), 614-635.
- Kochanska, G., Woodard, J., Kim, S., Koenig, J. L., Yoon, J. E., & Barry, R. A. (2010). Positive socialization mechanisms in secure and insecure parent-child dyads: Two longitudinal studie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1(9), 998-1009.
- Lagattuta, K. H., Nucci, L., & Bosacki, S. L. (2010). Bridging theory of mind and the personal domain: Children's reasoning about resistance to parental control. *Child Development*, 81(2), 616-635.
- Liu, G. X., & Fang, F. X. (2005). Preschoolers' understanding of conditional warning. *Journal of Chinese Mental Health*, 19(1), 28-30.
- [刘国雄, 方富熹. (2005). 幼儿对条件警告的理解.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1), 28-30.]
- Liu, G. X., Fang, F. X., & Keller, M. (2003). Preschoolers' understanding of conditional promis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5(5), 656-661.
- [刘国雄, 方富熹, Keller, M. (2003). 幼儿对条件许诺的理解. *心理学报*, 35(5), 656-661.]
- McKinnon, M. C., & Moscovitch, M. (2007). Domain-general contributions to social reasoning: theory of mind and deontic reasoning re-explored. *Cognition*, 102(2), 179-218.
- Núñez, M., & Harris, P. L. (1998). Psychological and deontic concepts: Separate domains or intimate connection? *Mind and Language*, 13(2), 153-170.
- Politzer, G., & Nguyen-Xuan, A. (1992). Reasoning about conditional promises and warnings: Darwinian algorithms mental models relevance judgements or pragmatic schemas?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44A(3), 401-421.
- Smetana, J. G. (1981). Preschool children's conceptions of moral and social rules. *Child Development*, 52(4), 1333-1336.
- Smetana, J. G. (2006). Social-cognitive domain theory: Consistencies and variations in children's moral and social judgments. In M. Killen & J. G. Smetana (Eds.),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 (pp. 119-153). Mahwah, NJ, U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Smetana, J. G., Jambon, M., Conry-Murray, C., & Sturge-Apple, M. L. (2012). Reciprocal associations between young children's developing moral judgments and theory of mi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8, 1144-1155.
- Smetana, J. G., Rote, W. M., Jambon, M., Tasopoulos-Chan, M., Villalobos, M., & Comer, J. (2012). Developmental change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young children's moral judgments. *Child Development*, 83(2), 683-696.
- Thompson, V. A. (2000). The task-specific nature of domain-general reasoning. *Cognition*, 76(3), 209-268.
- Triandis, H. C., & Suh, E. M. (2002). Cultural influences on person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1), 133-160.
- Turiel, E. (2008). Thought about actions in social domains: Morality, social conventions,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23(1), 136-154.
- Vittrup, B., & Holden, G. W. (2010). Children's assessments of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other disciplinary practices: The role of age, race, SES, and exposure to spanking.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3), 211-220.
- Verhoeven, M., Junger, M., van Aken, C., Dekovi, M., & van Aken, M. A. G. (2010).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externalizing behavior: Bidirectionality during toddlerhood.

-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1), 93–105.
- Wason, P. C. & Shapiro, D. (1966). Reasoning. In Foss, B. M.. *New horizons in psychology* (pp. 135-151). Harmondsworth: Penguin.
- Wellman, H. M., & Gelman, S. A. (1992). Cognitive development: Foundational theories of core domai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3(1), 337–375.
- Wellman, H. M., & Miller, J. G. (2008). Including deontic reasoning as fundamental to theory of mind. *Human Development*, 51, 105–135.
- Weston, D. R., & Turiel, E. (1980). Act-rule relations: Children's concepts of social rul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6(5), 417–424.
- Yang, X. D., Tardif, T., Liu, G. X., & Fang, F. X. (2004). Preschooler's understanding of "Knowing that" and "Knowing How".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6(1), 59–64.
- [杨小冬, Tardif, T., 刘国雄, 方富熹. (2004). 学前儿童对“知道”和“会”的认知. *心理学报*, 36(1), 59–64.]
- Yau, J., Smetana, J. G., & Metzger, A. (2009). Young Chinese children's authority concepts. *Social Development*, 18(1), 210–229.
- Zhu, L. Q. (2001). New findings in children's reasoning ability: Children's denotic reason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China)*, 24(2), 214, 220.
- [朱莉琪. (2001). 儿童推理能力的新发现——儿童的道义推理. *心理科学*, 24(2), 214, 210.]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ers' Deontic Reasoning in Moral and Conventional Domain

LIU Guoxiong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Young children's deontic reasoning has been abundantly addressed b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 since Wason Selection Task was simplified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reasoning abil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children around 2 to 3 years of age can make different judgments toward violations in moral and conventional domains. In the mean while, researches on children's Theory of Mind development also boomed. These studies, to some extent, all seemed to support the domain specific theory of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a recent research by Liu, Fang, & Keller (2003), children's deontic reasoning was explored in conditional promises between mom and her child such as, "if you dress yourself everyday this week, mom will take you to the zoo on Sunday". In their task with vignette, both mom and her child knew about the other's action before the contract was due. In Keller, Gummerum, Wang, & Lindsey (2004)'s study, however, both sides in the contract had no idea what the other was doing during the contract period. The ignorant deontic reasoning paradigm of Keller et al (2004) was deemed to be simpler in procedure and related to children's theory of mind development, thus was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ule content of morality and social conventions, affirmative or inhibitive, to explore young children's deontic reasoning and have a tap on the domain specificity of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Ninety-six 4-, 5-, and 6-year-olds (48 girl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an ordinary kindergarten of Xuzhou, Jiangsu Province, who was organized into three age groups: 3-year-olds, Mean age =4.03; 4-year-olds, Mean age =4.93; 5-year-olds, Mean age =5.94. They were tested individually by telling stories accompanied by illustrations.

Results show that: 1) Similar developmental trends and role effects were found in preschoolers' deontic reasoning of both moral rule and conventional rules, that is, most preschoolers can detect the peer (the child protagonist in the story) violation in the contract, and percentages detecting mother's and bilateral violation increase with age. In particular, some of 4-year-olds detected mom's violation successfully, and even some of the 5-year-olds detected bilateral violation. 2) Under the paradigm of ignorant deontic reasoning, many 4-year-olds falsely reported that the protagonist violated the con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mother was the true violator, and many 6-year-olds falsely reported that mother violated the con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 protagonist was the true violator. 3) Though preschoolers' deontic reasoning of moral rules and conventional rules showed similar patter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their reasoning about affirmative social rules and inhibitive social rules. 5- and 6-year-olds' detection of peer's violation in inhibitive moral rule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around 56%) than that in affirmative moral rules, whereas 6-year-olds' detection of mother's violation in bilateral violating situations in inhibitive moral rules is rather higher. 6-year-olds' deontic reasoning of conventional rules showed similar differences caused by affirmative or inhibitive rules.

These findings excelled some conclusions of previous studies, and indicated both the generality across domains and the specificity within domains in preschoolers' deontic reasoning of moral and conventional rules.

Key words moral; convention; deontic reasoning; preschoolers; theory of mind